

政治学研究·政治思想史百年研究专题

【编者按】作为现代政治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政治思想史（1920年）和中国政治思想史（1922年）先后形成，国内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历程由此开启。此后百年间，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也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我国的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鉴于目前有关政治思想史百年发展历程的回顾性研究还不充分，我们邀请了分别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的两位学者，对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史和研究史进行梳理解读，总结已有的成就和经验，分析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寻找突破现状的未来出路。我们期待，通过在新的时间节点呈现该领域中青年优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争鸣，以推动国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百年基础之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 三重困境与反思^{*}

余艳红

【摘要】百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既是中国人思考政治的重要叙事方式，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缩影。纵观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科身份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以及学科对话问题，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重困境。只有重构政治思想史的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既从普遍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政治思想中内含的人类对政治问题思考的诸多同一性，又从特殊主义的视角窥视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人建构自己的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的特殊性，才能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奠定长远的基础，也只有这样，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与魅力。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 学科身份 学科价值立场 学科话语权 政治秩序

【作者简介】余艳红，政治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0）05-0005-12

在政治学领域，或许没有任何一门分支学科像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样，有着如此强烈的学科意识与扩展学科话语权的自觉，以至于如何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例如，在中国知网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篇名检索2019年的文献，可以检索出13篇，而以“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同样的检索，则只能检索出1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们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究”（15AZZ006）的阶段性成果。

的这些努力，彰显的不仅仅是这门学科的自我反思与扬弃精神，更蕴含着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最终折射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困境。这种困境，既是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时的危机隐喻，也是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在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的思想表达，更是现代中国在面对未来维度时的审慎自省。百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是中国人思考政治的重要叙事方式，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缩影。可以说，在中国，如何建构、叙述与表达中国政治思想史，早已超越了认识论与知识论等学术问题，既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传统、看待当代以及看待未来的问题，也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看待他者以及如何建构两者关系的问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诞生近百年的时间点，重新梳理与回顾这一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审慎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故事，既是这门分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建构一流的中国政治学的必然要求。^①

一、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重困境

1922年春，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正式创建，至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研究内容上，既有诸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样经典的教材与通论，也有诸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样的长篇力作，至于诸多特定时代或者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更是灿若星辰。诸如冯天瑜对明末清初思想家思想的挖掘，任锋对治体论的探讨，章永乐对康有为思想的关注，罗志田对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许纪霖对20世纪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剖析等，都是这些研究中的典范。在研究主体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是百家争鸣。除了大陆学者之外，海外学者往往构成了研究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具体的研究成果方面，还是在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拓展方面，他们都贡献颇丰。余英时对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研究，列文森关于儒教中国的研究，张灏关于传统中国幽暗意识的研究，王汎森对章太炎思想的研究，汪荣祖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沟口雄三关于中国的公与私的研究，都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在研究范式上，中国政治思想史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历史学范式为主到今天的政治学范式、经学范式以及历史学范式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样是百花齐放。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百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实际上，纵观近百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依旧感觉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说法本身就预设着某种隐喻。这不仅仅是由于传统中国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思想史”，也是由于即使在西方各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中，一般也只有“政治思想史”，而并没有以该国冠名的某国政治思想史。故而，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主体意识的追溯和确认。这种对主体意识的追溯和确认，既源于传统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的系统入侵而给精英阶层带来的焦虑感与危机意识，也与一种从历史中发现智慧的历史主义情结息息相关，但这种对主体意识的自我追溯和确认带来的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重困境。

（一）学科身份困境

从学科身份上看，虽然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并且将之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群体来源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生招生与学科发展，很

^① 由于包括台港澳在内的海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人数众多，成果颇丰，且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式与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本文所指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主，但也适当兼及海外研究群体及其成果。

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都贡献了智慧。这种悖论，其实彰显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身份困境。正如杨阳所说，“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创建之初起，就一直存在着学科身份辨识的问题”。^① 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学术资源、学科边界、学科属性以及学科的概念、内容体系和思想谱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模糊性，也容易引起争议。如上所述，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贡献甚多的海外学者大多数属于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其中历史学领域最典型的包括余英时、张灏、汪荣祖以及王汎森等，哲学领域最典型的是贝淡宁（Daniel A. Bell），我们却很少看到海外纯粹的政治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有较好的建树。同样，中国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的学科来源也是高度多元化的，梁启超、刘泽华、吕振羽等人出身于历史学，而陈明、曹德本等人则出身于哲学学科。这其实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学科边界困境，换句话说，这门学科究竟是属于政治学，还是历史学，抑或是哲学？此外，在国内教材方面，我们也能窥见这种困境。传统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政治思想”典籍，更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清晰的思想与学术谱系，即使是政治思想较为浓厚的经学与子学，其内容也涉及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乃至法学与经济学等。因此，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其早期内容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中国的各种典籍中，按照他们自身对政治思想的理解整理编辑而成，而其体例往往是传统史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杂糅，这样一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存在着先天的学科边界模糊的困境。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单列专门的各章讨论“寝兵运动”“教育问题”和“生计问题”，^② 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专门列章节讨论“儒家的经济与财政理论”，^③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些内容似乎跟政治思想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三者之间不仅在内容体系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在写作方法、价值立场、核心概念和语言风格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虽然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有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但其核心的内容体系往往是一以贯之的，很少出现像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样明显的断裂。

其次，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还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话语权方面。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的国家层面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畴，但就实际的学科话语权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非常不乐观。就内部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乎成了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仅次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冷门。在国内，除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几所高校有基本的研究传承之外，甚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政治学学科研究的重镇，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此外，在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方面，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立项数量在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是最少的。以最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为例，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含重点、一般、青年类）政治学类一共162项，即使是在宽泛的意义上属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也只有1项，而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有7项（含重点项目1项）。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含规划、青年类）政治学类一共26项，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立项数更是降到了0。也正是因为如此，一部分明显属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选题，其研究者往往选择通过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申请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项目，^④ 这恰恰在一个侧面说明了这门学科的身份困

① 杨阳：《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百年回顾》，《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65页。

②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9、233、241页。

③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④ 以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含重点、一般、青年类）为例，《西汉儒家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明代关学学派政治哲学研究》等选题在哲学学科门类之中；《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与美洲华侨认同研究》《宋代的汉唐观与国家认同研究》等选题在历史学学科门类之中。

境。就外部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外话语权传播机会远远不如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比如在论文发表方面,一方面,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群体极少有机会通过国际平台特别是国际期刊扩展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群体人数较少,这方面的论文一旦刊发,往往存在着引用少、转载少等情况,这对追求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来说,也是致命的弱点,因此国内的学术期刊对刊发这方面的论文往往有一定的现实顾虑,最终也反过来影响了这门学科在政治学领域的话语权。至于学术期刊,目前国内仅有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思想史》季刊是专门探讨中外政治思想的,虽然刊发的论文质量不错,但时至今日,该期刊也仅仅位于CSSCI扩展版的序列。

最后,这种学科身份的困境体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方面。就研究主体而言,当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海外学者和大陆学者之间似乎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术共同体,这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成为常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制约大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陆学者的学科来源,跟海外研究者类似,也是高度多元化的,这种特征虽然能够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样化,但也加剧了这门学科的身份认同困境。来源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促成了这门学科研究的多种范式。来源于历史学的学者构成了历史学研究范式的主体,来源于哲学研究的学者是经学范式或者文化保守主义范式的主要代表,而受过比较纯粹的政治学知识训练的学者则力图让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成为主导。^①在这些范式中,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构成了最强势的话语体系,而纯粹的政治学范式长期以来还是停留在萧公权开创的理路之中。可以说,如何平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各个范式之间的张力,使它们彼此能够融会贯通,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对话,最终使中国政治思想史既具有哲学的思想性、历史学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同时又具有现代政治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建构性,依旧是困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难题。

(二) 价值立场困境

政治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一门科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首先要追求的是学术性与思想性,这就是政治知识的探索,政治思想的传承,发现政治领域中的正确,寻求政治中的因果律,解释人类的政治发展变迁,并以理论化的方式对这些发展变迁进行模式化的处理,最终扩展人类政治知识的总量,而不是直接追求为政治服务,甚至追求成为“王者师”。但是,即使是纯粹的政治思想研究,其结果也可能具有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比如,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著名的施特劳斯学派,其对政治思想所做的所谓古今之争的阐释,实际上起到了对整个现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作用,并从价值立场上导向了古典政治。

中国政治思想史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在它诞生之初就自觉地承担着一种历史使命,这就是为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智识资源,并为现代中国的政治设计与政治追求提供价值支撑。正如张师伟所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承担起了批评和批判旧政治、旧文化和旧伦理的时代使命,发挥了启蒙与救亡的思想作用”,而“知识论取向”的研究则是“零星”的。^②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独特的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困境:即在研究的价值立场上,往往意识形态先行,而学术与知识追求成了第二位的,最终导致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由于这种困境肇始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历史使命,因此,它主要见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之中,而某些海外学者由于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身份与视角,则很好地规避了这种价值立场困境,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海外学者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学术研究上更

^① 张师伟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大范式分别是政治学范式、经学范式和历史学范式。参见张师伟:《范式争鸣与方法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2期,第3~21、196页。

^② 张师伟:《范式争鸣与方法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2期,第16页。

容易产生经典，而长期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特别是在专门领域却乏善可陈。

我们只要简要梳理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程，就能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史，跟现代中国的政治追求历程是高度同步的，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形态性质”。^①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开篇即讲“本问题之价值”，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是“世界主义”“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其论证的方式大有比附之嫌，但我们只要想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几乎席卷中国各大政治派别，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政治思潮，我们就能发现，其研究的价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要从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寻找当时盛行的政治思潮的基因。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堪称以政治学范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之典范，但该著作同样“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对专制政体和异族统治的严厉批判”。^②实际上，贯穿该著作始终的主线主要是两条，其一，传统中国的专制政体及其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跟传统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想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因而，绝对不是“吾家之旧物”。^③其二，带有浓重目的论色彩与一元主义倾向的进步史观。故而，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其实对应的是近代中国的启蒙世界观与价值立场，在更深层次上，表达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至于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典范，更是要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谱系，视为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的脚本，其对应的显然是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因而其内在的思维方式跟萧公权的政治学范式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一元主义的进步史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学术化。刘泽华认为“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④主张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进行推陈出新，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进行拓展。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首要价值，正是从学术上大大提升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水平。曹德本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取向、历史局限等问题”，^⑤实际上也是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首先还原成学术问题与知识问题。但是，价值立场的争论在这一领域依旧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中，反封建和启蒙的价值主要集中在王权主义学派等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中。”^⑥至于经学研究范式或者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他们甚至以一种“我注六经”的使命感，主张从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寻找解决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的智慧，甚至主张以儒家的王道仁政、民本思想、天人合一观念以及中和理念为基础，建构出儒教的宪政，实现“天下大同”的目标。^⑦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无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本身，而只是将其当成实现自己文化与政治理想的一个工具”。^⑧

历史地看，有三个原因加剧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张力。第一个原因是政治学

①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第18页。

② 杨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第79页。

③ 例如，其论孟子之民贵说，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其论庄子之个人主义，认为庄子的个人主义对“个人表无条件之信任，对组织持无限度之轻蔑”，这与欧洲的个人主义有明显不同，因为后者“对社会与政治之态度非消极”。详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7、187页。

④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87页。

⑤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⑥ 张师伟：《范式争鸣与方法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2期，第4页。

⑦ 参见包万超：《天人合一与儒教宪政的哲学基础》，《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31~36页。

⑧ 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第19页。

就是一门意识形态极强的学科，“政治学一直是研究观念和‘主义’的学问”，“从古到今，从他国到中国，意识形态权力都与政治权力如影随形”。^①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它的科学性，意识形态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总是带着某些政治价值偏好和甚至预设的立场去进行思想表达与叙事，而政治思想作为政治中阐释与表达各种“主义”的场域，其意识形态色彩就更为明显。第二个原因是，在传统中国，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一直秉承着“文以载道”的传统，承载着弘扬道统的使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早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开拓者们，很多都是旧学中长大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家国情怀的自觉。第三个原因是，近代中国本身就面临着秩序的危机，这种秩序，既包括现实的秩序，就是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也包括心灵的秩序与观念的秩序，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与政治合法性叙事的重建。前者可以说是救亡，后者则是启蒙，而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政治的重要性都会被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的研究者，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其实就无形中承受了一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因此，纯粹的知识表达与学术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其直接结果是中国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知识沉淀与研究水平方面，往往不及政治学、历史学与哲学学科内部的其他分支学科，更与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相差甚远。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也依旧很难在中国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找到可以与海外诸如余英时、张灏、王汎森、柯文这样的人物进行对话甚至学术水平比肩的研究者。因为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紧张，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么作为对现实政治的注脚而起到一种为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既牺牲了学术，也牺牲了政治；要么作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甚至颠覆而可能遭到政治的扼杀。不宁唯是，这种过于追求政治与实用主义的立场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随意甚至刻意进行加减法，从而忽视或者遗漏掉诸多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资源。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追寻“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直是一个严肃的使命。^②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思想史如何把握自身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依旧是困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难题，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审视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甚至研究立场的困境。或许，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认真对待学术问题，不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在描述性、经验性与解释性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那么，他们也就很难真正完成自身的政治使命，在规范性方面有所建树。

（三）学科对话困境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对话与争论是一个学科成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受困于这门学科的对话困境，这种对话困境既表现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各范式之间的对话困难，也表现为这门分支学科跟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困难，更不必说让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与西方的学者进行对话，走向世界。

首先，政治价值立场限制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内部各范式之间的对话。从常理看，既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主要来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等不同的学科，那么，在讲究跨学科话语对话的时代，这种对话应该更具有优势。历史学小心求证的作风可以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严谨性，哲学的思辨性可以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穿透力，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可以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关怀。但如前所述，由于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一直存在着价值立场先行、学术为政治进行注脚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不同范式的对话实际上就非常困难。一方面，对话各方容易因

^① 杨光斌：《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兼论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党政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页。

^② 在这方面，刘泽华先生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堪称典范，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方面增补了诸多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或者淡化处理的人物，如隋文帝、宋濂、海瑞等，而且也主张对民国政治思想人物进行扩展性的研究。

为自我感觉占据道德制高点与真理话语权而处于一种强势地位，从而限制了对话应有的平等、沟通、交流、妥协、倾听等品质。另一方面，由于对话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与思想争论，而是涉及重大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政治价值争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容易陷入一种质疑动机、立场的状态，甚至上升到“敌我”的高度，从而消解了对话的可能性。

其次，学科话语权、学科语言以及学科概念等限制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跟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对话。在政治学学科内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话语权几乎是最弱的。这种学科话语权的弱势，直接同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端是西方政治学，而西方政治思想史又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知识来源有关。因此，在政治学学科内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语言与概念至少部分是这个学科的常识，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名著长期位于政治学专业学生必读典籍的行列，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也几乎是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必考科目，故而，即使不是专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家乃至主要的思想谱系，都有大致的了解，从而为对话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与基础。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很多开设政治学专业的院校中并非必修课，其学术经典并非学生的必读书，^① 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也仅有少数几所高校将其列为必考内容，故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典籍、核心概念、基本的思想谱系与脉络，即使很多政治学的研究者，也是极为生疏的，更不必说与其进行对话。另外，古文文献的阅读困难也使得政治学学科内部其他研究者对这一学科方向往往望而却步。

最后，对传统中国政治的标签化处理限制了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者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可能性。近些年来，一部分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者致力于探索中国政治思想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组成部分”，因此，“走向世界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②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融合现代政治理念，由此开通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③ 但是，现实地看，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世界对话的愿景依旧没有实现。这其中的原因，诸多学者都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葛荃认为，正是中国话语的语义涵容性、体悟方式以及比类逻辑，才导致了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语境差异预设在先，难以弥合。^④ 任剑涛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者没有融入到西方的“价值世界”“思想市场”和“学术圈”，没有接受他们的“评价标准”以及缺乏明确的“实践指向”，是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⑤ 在笔者看来，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传统中国政治的标签化处理，也是制约这一学科方向的研究者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传统中国没有政治学这门学科，更不必说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思想史，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近现代的研究者在传统中国的各种典籍特别是经学与子学中进行爬梳，并按照传统史学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思路进行整理而成的。这里面隐藏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如何理解政治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问题。从词根上说，政治是 POLIS，就是城邦，而城邦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土地或者城市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是由自由平等的公民对城邦进行治理，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对城邦的治理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公民们的事情，是集体的事业，“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与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⑥ “政治是自由平等公民的轮流统治活动”。^⑦ 此

① 比如，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基础阅读书目的 100 本书中，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专著仅有 4 本，而西方政治思想方面的专著有 34 本。又比如，在 2020 年世界读书日，“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列举了 20 本各大高校推荐程度最高的政治学阅读书目，其中 14 本属于西方政治思想领域，仅有 1 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可以勉强算入中国政治思想领域。

② 孙晓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何以走向世界》，《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80、78 页。

③ 葛荃：《话语建构和走向文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断想》，《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82 页。

④ 葛荃：《话语建构和走向文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断想》，《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82~83 页。

⑤ 任剑涛：《置身“世”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世界念想》，《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第 88 页。

⑥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11 页。

⑦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6 页。

外,从治理方式上看,城邦或者说政治是一个靠理性言说也就是讲道理来治理的领域,“越是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就越远离政治”。^①

然而,当我们把镜头的广角对准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如果按照西方“政治”的原初含义,传统中国的政治几乎是“非政治”的。一方面,从词汇上看,“政治”这一概念在传统中国的典籍中出现的频率极低,^②而且在中国语境中,无论是“政”,还是“治”,其核心都是执政者通过某种方式引导人们,规制人们,因此,从主体上看,政治在中国的语境中,一直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不是“公民的事业”。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被中国的历史学界以及党史学者进一步阐释,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概念,这其实已经消解了中西政治思想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因为专制从其本意来说,乃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③这与西方政治概念谱系中的理性言说和对话精神相距甚远。这样一来,中西政治思想的对话,又重新回到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路,这种对话,本质上已经是不平等的,是预设了立场与价值优先顺序的。

二、走出困境:如何发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

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依旧只能作为传统中国专制主义的注脚,或者成为现代政治价值的复制品,或者遵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框架,而不能为世界政治中的他者观察与反思其自身的政治提供参考,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价值就是十分有限的,更不必说走向世界,与他者进行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要超越我们前述的三种困境,必须首先重构政治思想史的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这种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既要防止彻底西方化,也要杜绝过分中国化,而是以一种还原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政治思想史的存在价值论。

如果我们从超越古今、中西的角度去重新思考政治的话,可以说,人类之所以需要政治,是因为政治是人类建构秩序最有效的方式,也是维系人类文明最有效的方式,“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秩序的理论”。^④因为政治中蕴含着一种正义,一种公平,一种人类超越野蛮而建构文明的系统性努力。而政治思想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理论化的方式描述这种政治秩序,维系或者改革这种政治秩序,并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蓝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都可以看成是人类尝试建构政治秩序,建构政治文明的理念表达与叙事,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同时也意味着,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与中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对话,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中国政治思想的存在价值论,并不一定非要以“王者师”的姿态出现。

首先,政治思想是人类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在建构政治秩序的道路上,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思考而形成的政治智慧,而人类作为地球上特殊的“类存在”,彼此之间一定保持着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总是有一些彼此共享或者能够对话的“永恒的观念单元”,而政治思想就是对这些“永恒的观念单元”的政治阐释,政治哲学就是关于这些“永恒的观念单元”的知识追求。在此路径之下,我们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建构政治秩序的那些共享的观念进行阐释。比如合法性的概念,它虽然是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可以说,一个政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都意味着某种合法性。或者说,任何一个政治体系,

①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第256页。

② 通过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以“政治”作为检索词汇,按照经、史、子、集四类先后检索先秦文献,仅有《尚书》《周礼》《毛诗》中出现了“政治”这一概念,且累计也仅有5次。

③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④ 李强、张新刚主编:《政制论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总序”,第1页。

都一定在政治实践中进行了合法性的表演（描述性），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政权才有可能维系下去（解释性），并使得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得面对这一问题（规范性）。这样一来，合法性的观念，就是人类政治思想表达中的“永恒的观念单元”。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思考，卢梭认为强力不构成合法性，甚至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史，从观念上看，与传统中国周朝的“以德辅天”，西汉董仲舒的“天谴论”，以及宋明理学，其实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建构合法性的不同叙事与不同表达，都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概念进行统摄，并为相关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了空间。

其次，所有的政治思想中都有一定的超越性智慧。这倒不是说政治思想家们是带着超越性的价值关怀去思考政治问题，任何一种政治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年代，也是思想家对特定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但政治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即使思想家们思考的是特定时代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隐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普遍主义的智慧。可以说，如果政治思想的价值只局限在特定的时代，只具有博物馆的考古与观赏价值，或者作为历史学的文献注脚，那么，政治思想的研究就不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和穿透力，更不会形成一个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思想谱系。实际上，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政治学这样，对其学科发展的思想史有着如此的痴迷。政治思想的永恒魅力在于它的超越性智慧。这是因为，人类自身作为“类存在”具有诸多方面的高度同一性，比如他们总是面临着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会充满恐惧与不安，理性会让他们思考如何建构秩序，思考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等。正是这种“类存在”的同一性，使得他们面临的政治问题同样具有诸多的同一性，甚至具有永恒性。这些问题，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且永恒的主题，不会因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比如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组成共同体？国家权力的限度在哪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怎样制约权力？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泉是什么？这些问题，从形式逻辑上看是超越时空的，只要有政治，这些问题就会存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因而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中的表达也就有了一定的超越性，这些思考在任何时候都能给后人思考他们时代的政治问题带来启示与反思。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中国古人之所思所想，未必不具有超越时空之意义”。^①正因为如此，政治学专业的学习，一直强调对政治思想史典籍的阅读。同样，在这种意义上，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的对话，也获得了价值支撑。

最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蕴含着某种正义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诸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善的这样的观念，是人类建构美好政治生活的尝试，但同时也体现着人类理性的限度。人类的政治之所以能够自我强化并历史性地延续到今天，并非完全靠赤裸裸的暴力，虽然今天的政治学者习惯对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来确定现代国家的本质。政治总是蕴含着正义，蕴含着某种善，“所有的政治行动本身都指向了关于善的知识：关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②这种正义的观念既构成对以往政治的反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也构成对未来政治的期待。儒家的“民本”，法家的“法不阿贵”，道家的“齐物”，西方的古典自然法，罗尔斯的正义论，都蕴含着某种关于正义的叙事，因此中西政治思想史在这一层面上也可以说是正义观念的历史性表达。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诠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那些有意义的命题，从政治正义的角度审视这一思想谱系中那些支撑华夏民族观念共同体绵延不绝的智慧，依旧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此外，在如下意义上，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有对话的空间：政治思想作为人类在面对自身世界时建构秩序的一种最高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反映着人类在特定时刻集体理性的限度与高度。这是因为，政治思想家们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他们的政治思考也往往能抓住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

① 颜德如：《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当前应如何认识与对待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论坛》2014年第17期，第22页。

② [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治问题和最基本的社会焦虑，故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政治思考和政治思维能力的极限与最高水平。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去思考政治思想史叙事的话，那么，各民族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一种特殊主义的方式回应着某些普遍主义的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不仅仅只是属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史，它蕴含着人类思考政治问题的观念单元，体现着人类对正义的价值诉求，表达着人类在特定历史时刻理性的高度与限度，并因为人类面对政治问题的同一性而在普遍主义的意义上获得了对话的可能性与价值支撑，因此，“其中包含着能够为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理解并且珍视的知识”。^①换句话说，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必定是“政治思想史在中国”，它从来就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政治表达，而是内置于人类政治思想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本身就是人类思想与精神的遗产。

“政治思想史在中国”，这意味着，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发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中国并不完全是普遍主义的，而且，正是因为政治思想史内嵌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它就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表达。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西方政治思想所无法表达或包容的概念，如义与利、公与私、天理与人欲、王道与霸道等。这些概念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钥匙，是表达中国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思考现代中国未来政治的重要维度。我们不必因为这些概念无法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接轨就忽视它们独立的价值，这些概念恰恰是传统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的重要表达方式与逻辑。如果强行比附西方政治学中的价值，其实是消解了这些概念的生命力，也无助于我们认识与理解中国人建构自己的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的特殊性，因为这些概念彼此之间建构起了一整套观念话语体系，并借助于中国的历史语境而不断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需要尊重悠久传统的内在机理，真正客观认真地对待传统内部历史与现实之间产生的问题与张力。”^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还是要回归学术性与思想性，以现代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对传统中国的这套政治话语体系进行阐释，“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为现时代的人们可以理解的知识”，^③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国人政治思维的复杂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思想史在中国”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重新检讨当下某些研究形成的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格式化命题，从而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中西对话以及古今对话提供广泛的、开放的、具有极强包容性的空间。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绝非王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所能统摄，无论是作为道统传承的儒家知识分子对“道高于势”的追寻和对王道合法性的建构，还是以道家思想为载体形成的对文明与政府的颠覆性批判，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彰显了政治中那些最为核心和最为基础性的问题，并给予了富有意义的回答。同样，对于百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存在的西学价值比附的现象，在当下也应该予以警惕。因为这不仅会使得中学持续成为西学的附属品，而且也会消解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那些核心概念与命题中的丰富内容，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人在审视未来政治发展维度时的价值选择。此外，大陆的研究者们如何走出因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的心理困境与价值立场困境，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空间，进行具有国际视野的对话，更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政治思想史在中国”还意味着，我们需要站在人类共同体的角度看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确实，如前所述，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存在着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无法与国际同行

① 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自序”，第3页。

② 任锋：《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第75页。

③ 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自序”，第3页。

进行对话与交流，难以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等难题。^①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既属于一般思想史的研究范畴，也属于一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它需要以他者可读懂的方式成为人类政治思想研究的共同遗产，因此它必须走出去，而不能“置身‘世’外”，故步自封，更不能过分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成一体性或者特殊性。这种“走出去”的战略，包括如何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经典翻译出去，如何与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海外学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典籍中提炼具有普遍主义价值的命题，都是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挑战。不宁唯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它要深刻理解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思想谱系，将中国政治思想放在人类思考政治问题、建构政治秩序、实践正义与公平的坐标中，全方位审视它的合理性、局限性以及特殊性，并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捕捉人类在重大时刻何去何从的选择智慧，学会从学术与理性而非激情与感性的角度回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那些重大的政治命题，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政治思想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三、结论

建构立足于中国本位、中国视野与中国价值关怀的政治学，是建构一流的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要求，而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样也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定位。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学科身份问题、学科价值立场问题以及学科对话问题，依旧是困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难题。只有重构政治思想史的价值叙事与合法性叙事，既从普遍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政治思想中内含的人类对政治问题思考的诸多同一性，为世界政治中的他者观察与反思其自身的政治提供参考，同时又从特殊主义的视角发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从中窥视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学术与思想的统一，世界视野与中国情怀的统一，最终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既具有哲学的思想性、历史学的严谨性与学术性，同时又具有现代政治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建构性，才能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与魅力。

（责任编辑：任玥）

Three Dilemma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Yu Yanho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past centu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narrative method for modern Chinese to think about political issues, but also an epitome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faces dilemmas in terms of disciplinary identity, value standpoint and disciplinary dialogue. Only by restructuring the value narrative and the legitimacy narrative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can we lay a long-term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To be spe-

^① 任剑涛：《置身“世”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世界念想》，《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89页。

cific, we must not only think about the many identities of mankind's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issue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alism, but also look in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to build their own identity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ism.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demonstrate eternal vitality and charm.

Keywords: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disciplinary identity; disciplinary value standpoint; disciplinary discourse power; political order